

民国外交官传记丛书

石源华

主编

顾维钧传

金光耀

著

河北人民出版社

总 序

近代以来，随着中国与世界联系的日益增多，从事对外交往事务的官员也随之大增，开始一般由政府官员兼任，进入民国时期逐步实现专业化和职业化，形成了一个以外交为终生职志的外交官群体，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和领导者也常常被称为外交家。外交家，顾名思义是指代表一个国家对外进行交涉，为本国的国家利益而活动的政治家。他们的政治地位和国际声誉主要取决于他们的时代机遇和本国的国际地位和综合国力，也与他们本人的知识结构、学识修养及外交能力相联系。

首先，要向广大读者交代的是，本套丛书的编纂由来。对于民国外交人物的研究是中国近现代史研究中颇为薄弱的环节。1989年，我发表了《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合撰）一文，^①首次全方位地评述了这位杰出外交家不平凡的一生，指出他在半个世纪中积累的外交经验是“中华民族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对于学术界重新研究和评价民国时期外交家的历史地位产生了一定的影响。1994年，我在拙著《中华民国外交史》一书^②的绪论中进而

① 石源华、钱玉莉：《著名的外交家顾维钧》，《上海研究论丛》第2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9年2月出版。

② 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

指出：“对于民国职业外交家群体的研究，包括对于他们的成长道路、外交思想、功过是非的评价，不仅本身就是民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而且对于深化该项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该书本身对于此点仅是涉及而已。随后的几年中，我十分关注外交人物的研究。令人遗憾的是，在中国大陆已出版的众多历史人物传记中却很少能读到外交家，尤其是民国外交家的传记，或者说没有从外交家的角度去研究某些重要的历史人物。开展这方面的研究，既可深化近代中国外交史的研究，总结近百年来中国对外交涉的经验教训，具有学术意义，又有助于进行爱国主义和民族传统的教育，具有现实意义，外交家们富于传奇色彩的政治阅历和波澜壮阔的外交生涯，也必定能引起广大读者的浓厚阅读兴趣。

出于这样多方面的考虑，我和一批年轻的朋友合作编着了《中国十外交家》，^①选择郭嵩焘、李鸿章、黄遵宪、曾纪泽、陆征祥、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陈友仁、宋子文10位外交家作为晚清和民国两代各个时期外交家的代表，为他们立传，同时还编纂了《近代中国外交行政历任行政首长小传》，收入晚清和民国时期担任或代理、署理过外交行政机关首长的43人小传，此书已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然而，由于编纂方针和篇幅方面的原因，该书对于外交家们的描述还是浮光掠影式的，尚不能称为严格意义上的研究性著作。

编著民国外交家的研究性传记，成为进一步开展近现代中国外交史研究的重要课题。河北人民出版社适时地将此列为重点选题，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王建朗博士的联络和促进下，由我担任本套丛书的主编。经与出版社反

^① 石源华主编、戴鞍钢副主编：《中国十外交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5月出版。

复磋商，决定先编纂民国外交家丛书，选择民国时期的重要外交家陆征祥、伍廷芳、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陈友仁、宋子文7人立传。以上这些人物的选择是否妥当？还有待于读者的评判。

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处在封闭的“中华帝国”之门被迫打开后，逐步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过渡时期。从古代到晚清再到民国，中国外交家经历了三个时代。中国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早在秦汉以前就与周边邻邦及中亚细亚地区进行经济和文化交流。秦汉以后，中国的对外联系远及西方，相传曾横跨太平洋到达美洲。盛唐时代，中外交往进入鼎盛阶段，远近前来通好的国家多达40余个。宋元时代，中外关系再次形成高峰，元蒙帝国横跨欧亚大陆，海陆交通遍及世界各地。明清时代，中国中央王朝依然是“控驭八荒，怀柔万国”，“四夷宾服，万方来朝”，郑和七下西洋，交往国家之多，航行规模之大，对外声势之壮，开创了世界航行史上的奇迹。在以朝贡为主要特征的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关系史上，中国古代外交家长期以来是中国天子的代表，“天朝主义”是其处理外交问题的总原则，“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是他们对于世界地理的基本看法，“天朝居中驭外”是他们对于国际政治格局的基本观念，“夷夏大防”、“王者无外”是他们处理涉外问题的基本准则，除了“朝贡”关系外，他们几乎不承认其他任何形式的中外关系。

进入晚清时代，帝国主义用大炮和鸦片轰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然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却依然沉浸于“天朝大国”的盲目陶醉之中。晚清外交家与古代外交家一样基本上由封建官僚兼任。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面对外国殖民势力的东来和中外交往中出现的新局面，不能适时提出新的外交战略和外交应策，依然是满脑子的封建士大夫的“正朔”观念，视所有的外国人为“蛮夷戎狄”，把外国来访的使节当作“向化来朝”的“贡使”，甚至为了坚持外国使节不得进京、谒见皇帝须行三叩九拜大礼等陈腐的礼仪而不

惜牺牲重大的外交权益。他们在对外事务中的昏庸无知和在国际舞台上的丑态百出，使他们的名字与近代中国丧权辱国的耻辱共存于世。他们中只有少数人较快地从中国外交失败的痛苦经历中觉醒，较早地接受了西方文明的精华，不同程度地更新了自己的知识结构，曾经提出过一些有价值的外交思想和主张，在中国的对外交涉中演出了若干好戏。如郭嵩焘出使英伦三岛，成为中国第一位驻外使臣；曾纪泽虎口夺食，索回已为崇厚割让的新疆伊犁；杨儒在对俄交涉中拒签卖国条约，以身殉职；薛福成有智有谋，索还滇缅边境大片国土；黄遵宪尽忠守职，对外交涉成绩卓著等等，尽管在整个晚清外交中数量十分有限，但他们毕竟为维护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实现近代中国外交与国际社会的逐步接轨，作出了有益的贡献。

民国时期的外交家伴随着清朝的灭亡和民国的诞生而逐步形成，他们是一个职业外交家的群体，是新时代的产物和近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他们与他们的先辈相比，面临不同的国际背景，肩负不同的民族使命，具备不同的知识结构，也有着不同的历史贡献。

民国外交家所处的国际环境发生了重要的变化，既不同于古代“万邦来朝”式的以大中华帝国为中心的世界格局，也不同于晚清列强环视、鲸吞瓜分中国的东亚格局。由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和世界殖民地半殖民地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迫使列强各国在中国的势力由进攻转为退守，北京政府的“太上皇”——外国公使团已不再风光；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更使得列强的在华势力大遭挫折，中国得以在国际会议上要求与列强各国全面修订不平等条约，并进行长达数十年的废除不平等条约运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和中国成为世界反法西斯阵营的成员，使得中国百年来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愿望成为现实，中国得以跻身世界“四

强”的行列，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和常任理事国。这种新的国际环境为民国外交家提供了广阔的活动舞台和施展才能的机会，他们虽然没有封建盛世时代的外交家那样高屋建瓴、纵横万里的气势，却比晚清外交家处处挨打、江河日下的处境好得多了。

民国外交家所负的民族使命也与他们的前辈大不相同。中国古代外交家的使命是代表皇帝炫耀封建王朝的显赫威势和强盛国力，颂扬“天朝上国”的恩惠天下和德政声名，维护大中华帝国的统一和强盛。晚清外交家的使命则是在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的情况下，消极地抵御列强各种形式的入侵，力图挽救和维护行将就木的清王朝统治。清王朝的垮台和民国的建立，使民国外交家的服务对象发生重大变化，他们不再为封建帝王尽忠效力，而以维护国家的统一和民族的利益为其奋斗目标。他们面对外敌入侵、军阀混战的内外交困局面，提出了不少富于创见而又适合中国国情的外交思想、战略和主张，在在表明他们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和值得称道的外交艺术，他们为争取中国独立自主的地位，收回晚清丧失的国家权利作了多方面的努力，改变了“弱国无外交”的旧规，谱写了民国外交史有声有色的新篇章。

民国外交家群体的构成和知识结构也具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一般说来，晚清的外交家如同古代的外交家一样来自所谓的“封疆大吏”，其任职的机关虽已由清朝的礼部和理藩院改为稍有近代气息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和外务部，但他们接受的教育则完全是正统的儒家学说，没有也不可能接受专门的国际关系学说和近代外交技能训练，一般也不懂外文，已不能适应变化了的国际环境和对外交涉的要求。进入民国后，中国外交体制逐步实现了与国际社会的接轨。北京政府首任外交总长陆征祥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对外交部进行了重大改革，规定只有经过外交专业训练的人，才能担任外交部的重要官员和驻外使领人员，这项改革得到了坚持，

民国外交家的总体素质有了大幅度的提高，形成了职业外交家的群体。收入本丛书的外交家可谓是其中杰出的代表。他们中不少人的家庭出身，都有基督教的背景，是中国最早接触西方文化的群体，这种背景使他们得以通过各种形式出国留学，在国外接受专门教育，通晓国际政治和近代外交知识，不少人具有博士或硕士学位，对于外交问题有专门的理论研究，如顾维钧著有《外人在华地位》、王正廷著有《中国近代外交概要》等。他们的留学经历、高学位以及学者兼外交家的身份，使他们易于为国际外交界所接受和得到尊重，便于在国际政治舞台上长袖善舞，以他们的博学、聪慧、才智以及与国际外交界的广泛联系，为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努力。

民国外交家的历史地位与社会贡献也与他们的前辈大不相同。中国古代的外交是封建王朝政治的附属物，一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结构不发生直接的重大影响，外交家的地位与作用也自然十分有限。近代以来，由于帝国主义的入侵，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的矛盾成为近代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矛盾之一，并且起着主导作用，外交成为决定和主宰中国社会发展的因素，外交家在中国政坛上的地位也大大提升。然而，近代外交家处在中国国际地位急速下降的过程中；他们的名字往往与丧权失地的耻辱相联系。民国外交家则处于中国国际地位缓慢攀升的过程中，他们的外交活动与改善中国的国际地位的努力相联系。他们在中国外交界的崛起，始于他们在巴黎和会和华盛顿会议上的卓越表现，山东问题辩论、废除二十一条交涉、拒签《巴黎和约》、促签《九国公约》、收回山东权益等，使顾维钧、陆征祥、施肇基、王正廷等“国际派”外交家蔚然成名，成为国际舞台上著名的外交活动家。随后，他们在实施北京政府的“修约外交”、广州武汉政府的“革命外交”、国民政府的“改订新约外交”、抗日战争期间“南联英美，北

结苏俄”的“抗日外交”和跻身世界强国的“大国外交”等过程中都不同程度地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中尤为值得称道的是，他们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广阔的国际舞台上，争取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战，推动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发展，签订中美、中英新约，参与创建联合国等，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记载。

尽管从总体上说他们所取得的外交实绩并不令后人满意，但他们为改变中国的国际地位而坚持不懈的奋斗精神已使他们声名大振。选入本丛书的陆征祥、伍廷芳、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不仅在国内深受各界的尊敬和推崇，而且有着很高的国际知名度。他们在中国外交界历任要职，不少人都是三代或四代元老，不仅当过重要国家的公使和大使，而且多次担任外交部的总长或部长，在中国的对外事务中不同程度地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在军阀混战、派系纷争的特殊政局下，由于他们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威望，而且从国外留学归来，一般与国内的政治派别无特别的联系，保持着某种超然的态度，使得他们在国内的政治生活中也发挥了超出常规的平衡作用。当各派政治势力势均力敌难以平衡之时，他们便成为能够为各派势力共同接受的人物。陆征祥、伍廷芳、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等都一次或数次担任过代理国务总理、国务总理，甚至摄行总统职权。这种由外交家代行国家元首的情况在世界政治发展史上是少有的现象，但在北京政府时代却极为常见。然而，进入国民政府时代，由于国民党独裁政治体制的形成，外交决策权逐步集中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其中央政治会议，后期则集中于蒋介石一人之手，外交家更多的须听命于“党国”，其个人施展才能的余地有所缩小，由政治家兼任外交家的情况也逐步增多。如宋子文就不是职业外交家出身，他是蒋介石的“钱袋”，更擅长于理财，但也一度出任外交部长，并数度以特使身份

担任重要的外交使命，成为近代中国非常有影响的外交家。收入本丛书的还有一位特殊人物陈友仁，他是长期侨居海外的华裔英国人，辛亥革命后自动归国服务，以律师兼新闻记者的身份投身国共合作的国民革命洪流，成为名震四海的“革命外交家”，他的经历虽与一般职业外交家不同，却数度出任外交部长，终生致力于中国的反帝事业，在中国近代外交史上占有特殊的一席。

由于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地位和帝国主义共同统治中国的基本格局并未得到改变，民国时代中国外交总态势仍然是被动挨打，以及时代和历史方面的诸多因素影响，也由于外交家们个人的某些原因，如他们中有些人曾自觉或不自觉地加入过军阀混战的行列，在对外事务中成为他们的附庸，也有些人由于长期生活在海外，与列强关系密切，也会在某些外交活动中受到他们的影响，被国人称为“亲日派”、“亲英美派”或“亲俄派”等等。有鉴于此，外交家们所推行的外交政策和经办的外交事务并非尽如人意，有的是不合时宜的，有的留下了失败的记录，有的甚至仍然是丧权辱国的，因而受到时人和后人的强烈批评。

新中国建立以来，在中华民国外交史研究中一直存在着两种倾向，一是以帝国主义侵华史取代中华民国外交史，一是以“弱国无外交”的简单结论取代对于丰富多彩的外交史的研究，这不仅不能正确地、全面地反映民国外交史的全貌，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对于民国外交家的正确评价。本套丛书在编纂过程中强调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研究外交家的一生，既充分肯定和褒扬他们的历史功绩，也不讳言并批评他们的失策和错误，力图向读者展现一个个活生生的历史人物，塑造一代民国外交家的新形象。

参加本套丛书编写的都是中青年的史学工作者，他们多年关注民国外交史的研究，接受过较为严格的历史科学的训练，大部分人均已有多种论著问世。其中张礼恒先生的《伍廷芳传》是在

他的博士论文基础上扩充修改而成的，金光耀先生则曾以“顾维钧与中美关系”为题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随后作为国家选派的访问学者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研究一年，遍读顾维钧生前捐赠该校的全部私人档案，在收集史料方面尤见功力。其余各书也都各有特色，完颜绍元的《王正廷传》、钱玉莉的《陈友仁传》、石建国的《陆征祥传》、陈雁的《颜惠庆传》在大陆都是首次出版他们的长篇传记，他们在史料星散的情况下，艰苦努力，广为收集各种史料，有的还采访了传主的后人，取得了不少极为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丰富了传记的写作。宋子文虽已有数部传记出版，但作为外交家来立传却是一种新的尝试，杨菁博士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努力。从总体上说，给民国外交家立传是一项新的尝试，作者的学术水平及用力程度也不完全平衡，丛书存在的缺点是在所难免的，我和本丛书所有的作者将本着“文责自负”的精神，恳切地希望广大读者不吝指教，以推动该项研究的深入和提高。

最后，我要感谢河北人民出版社的李保平社长和张晨光副总编，没有他们的远见卓识和热情支持，本丛书的出版是不可能的。我还要感谢本丛书责任编辑王静先生，从选题立项、作者选定、编纂进度、文稿审定等方面，他都做了大量细致而卓有成效的工作，而且这一切都是带病完成的，尤为令人感动。我衷心祝愿本丛书出版时王静先生已完全康复。

石源华

1999年7月于复旦大学

目 录

第一章 出身与教育	[1]
早年身世	[1]
留学美国	[6]
学士、硕士和博士	[11]
第二章 步入外交界	[18]
初涉官场	[18]
二十一条交涉	[21]
华盛顿最年轻的外交使节	[31]
力主随美参战	[37]
第三章 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	[51]
巴黎雄辩一举成名	[51]
周旋于代表团内外	[61]
拒签和约	[70]
参加华盛顿会议	[78]
山东问题的结局	[88]

第四章	黑暗内政下的外交	[96]
	出长外交	[96]
	解决中俄悬案	[102]
	修约外交的主角	[111]
	在派系政治的夹缝中	[120]
第五章	国难当头	[128]
	张学良的外交高参	[128]
	加入南京政府	[132]
	国联调查团“顾问”	[143]
	密谋改善中苏关系	[152]
第六章	出使欧陆	[161]
	在国联讲坛上	[161]
	驻法使节	[171]
	全面抗战初期的外交努力	[177]
	谋求合作争取外援	[187]
第七章	驻节英伦	[195]
	推进中英同盟关系	[195]
	介入中英新约交涉	[204]
	筹划宋氏兄妹访英	[212]
	参与创建联合国	[216]
第八章	重返华盛顿	[228]
	蒋介石委以重任	[228]
	争取美援	[235]
	游说美国朝野	[245]
	面对国民党的败局	[254]

第九章 外交生涯的终篇	[263]
动荡不定的美台关系	[263]
“共同防御条约”的艰难谈判	[275]
心力交瘁别坛坵	[286]
第十章 晚年	[293]
国际法院法官	[293]
退休生活	[297]
故土情深	[300]
民国外交的见证人	[303]
附录一 顾维钧大事年表	[309]
附录二 主要参考书目	[313]
后 记	[321]

第一章 出身与教育

早年身世

顾维钧，字少川，1888年1月29日出生于上海。兄弟姐妹中排行第四。成年后步入外交界以英文名 V. K. Wellington Koo 而著称于国际社会。

顾氏祖籍江苏省嘉定县（今属上海市）钱门塘村，是一户宦人家。^① 19世纪中叶，顾家是嘉定城中仕宦首户。1860年太平军逼近嘉定县城，城中士绅人家纷纷弃家逃奔几十公里之外的上海城。顾家也于此时离开嘉定迁往上海。兵荒马乱中，顾维钧的祖父被太平军抓获，后虽以钱财赎回，但因在被监禁时身心遭到严重伤害，回家不久就去世了。

家道中落后，顾维钧的祖母依靠嘉定传统的刺绣手艺维持生计，含辛茹苦地抚养4岁的儿子和怀抱中的女儿。10年后，顾维钧的父亲顾溶（字晴川）进入一家杂货店当学徒。成家后，顾溶留在岳父的报关行里工作，有了固定的收入，顾家的家境开始好

① 《望新乡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4年版，第236页。

转起来。

但当顾维钧的母亲蒋福安怀上顾维钧时，报关行因经济衰退而倒闭，顾溶一时失去了工作。顾维钧的母亲为此十分担忧，她已经有了两男一女，生活的艰难使她不愿再添孩子增加负担。因此，她指望依靠某种偏方进行流产。所幸的是，这一偏方并不灵验。而顾溶很快又有了更好的工作，到官督商办的大企业轮船招商局担任一条轮船的帮帐。经济状况的显著改善使顾家搬进了一所大房子，并在迁入上海后第一次雇用了仆人。顾维钧的母亲由此认为，是腹中的孩子给顾家带来了好运，并认为这是一个命硬的孩子。顾维钧出生时，顾家的家境已大为改善，重新成为殷实人家。后来，顾溶在慎裕洋行做过事，还担任过上海道的财政主管。^①

与当时有钱人家的孩子一样，顾维钧刚过3岁就与他的二哥一起进私塾读书。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父亲希望儿辈能熟读经书，精通八股文章，走传统的科举道路，重振顾家门风。

顾维钧的启蒙老师姓朱，是一个参加了十多次科举考试却都落榜的老童生。在私塾里，开始是认字，后来是读经书。虽然刻板单调，顾维钧还是很喜欢去上学。顾维钧在私塾念了7年，打下了初步的国学根底。以后他步入外交界，虽以精通英语、擅长英语写作和演讲而闻名，但处理中文文书也得心应手，这显然系受益于私塾的训练。

在私塾念到第七年，顾溶认为顾维钧应该集中精力读经书和八股文章，于是将他送到一个朋友家中。这个朋友为自己的子女请了一位有名的学者做家庭教师。学生一共4名，顾维钧嫌气氛

^① 据关国焯《顾维钧博士的一生》，顾溶还担任过大清银行的总裁，见台湾《传记文学》第74卷第6期。

沉闷，去了一天就不想再去了。顾溶为此十分恼火，但蒋氏出来帮儿子说话，认为不应让他到不愿去的地方读书。顾溶只得将儿子再送到原先的私塾去。

1899年，顾维钧听从姐夫蒋昌桂的建议，进入设在上海公共租界昆山路上的中西书院预科学习。这是一所由基督教卫理公会主办的学校，课程设有英文、算术、地理等，教师中有刚从美国回来的留学生。与传统的私塾不同，这是中国沿海地区刚刚兴起的新式学校。在这所学校中，顾维钧开始接触西方文化，并显示出他在学习上的天赋。在同班同学中，他虽然年龄偏小，但各科成绩都名列前茅，尤其在英语拼字比赛中，总能拔得头筹。

1901年，顾维钧又一次听从蒋昌桂的劝说，考入上海圣约翰书院学习。这是一所由基督教圣公会于1879年创办的教会学校，教师主要由美国人担任。与英华书院不同的是，它在19世纪末已开设大学课程。由于它的一些毕业生当时已开始在中国社会中崭露头角，学校的名声也就越来越大。

进入圣约翰书院学习，对顾维钧此后的人生有着重要的意义。圣约翰书院是一所人才荟萃的学校，尤其是民国时期许多著名的外交家都出自这所学校。顾维钧的老师中有刚从美国弗吉尼亚大学毕业回国任教的颜惠庆，顾维钧听过他讲授的英文翻译课。^①他的先后校友中有施肇基、王宠惠、宋子文。他们和顾维钧一样，以后都步入外交界，担任过民国政府的外交部长，成为著名的外交家。圣约翰的校长卜舫济在19世纪末曾说过，要把学校办成中国的西点军校，培养中国未来的领袖。^②就此而言，圣约翰书院培养出这么多民国时期的外交家当非偶然。

① 《颜惠庆自传》，台湾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顾维钧序，第3页。

② 顾长声：《传教士与近代中国》，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370页。

顾维钧的少年时代正是中国面临着严重的民族危机之时，甲午战争的失败、义和团运动后《辛丑条约》的签订，这都是中国悠久的历史中最耻辱的几页。生活在外国势力最集中的上海，顾维钧对外国人根据不平等条约所享受的特权有着切身的体验。直到晚年，他都清楚地记得外滩黄浦公园门前“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在中西书院读书时，有一个周末，顾维钧从学校回在南市梭子弄的家。他坐黄包车从外白渡桥上经过，因上桥车夫拉得很慢，跟在黄包车后面的一辆马车上的英国人急着去跑马场赌马，嫌黄包车挡了他的道，就用马鞭抽打中国车夫，少年顾维钧气愤地回头用英语斥责这个英国人：“你是绅士吗（Are you gentleman）？”不会说骂人话的顾维钧认为这是最严厉的斥责。

在圣约翰读书时，从南市到学校所在地的曹家渡要穿越法租界和公共租界。一次，骑自行车的顾维钧为避开马路上的车辆，跟在一个英国男孩后骑上了人行道，但英国警察放过了前面的男孩却将他逮住了。这件事也给少年顾维钧很大的刺激。可以说这是顾维钧立志外交的最初动因。他晚年时谈起外白渡桥那一幕时说，那时我就决心要废除列强在中国的租界，废除不平等条约。^①

顾维钧入圣约翰不久，学校为顺应社会潮流，聘请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中国教师。顾维钧的中文老师就是一位刚从日本留学归国的新派人物，他赞同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的主张。虽然，此时顾维钧还只是一个十几岁的少年，对社会变革和政治运动缺少深刻的理解，但像同时代大多数受到新思想影响的读书人一样，已开始向往社会的变革。正如他晚年回忆往事时所说，“主要是由于新教师的思想的缘故，我和我的同学越来越感到需要变

^① 顾维钧接受中国广播公司访谈（录音带无年月）；顾维钧手书《回忆录提纲》，1958年6月26日。